

哲学类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学源流

经学源流

中国文化精华文库



文学艺术类

● 诗骚与辞赋上下 ● 古文与骈文 ● 唐宋诗词上下 ● 杂剧与传奇
● 明清小说上下 ● 历代笔记上下 ● 书法精品 ● 名画精览

哲学类

● 九流十家 ● 经学源流 ● 道藏选粹 ● 佛典辑要

史学类

● 二十五史快读上下 ● 别史举要 ● 野史趣闻

科技类

● 土木营造与科技发明 ● 天文历数 ● 中医擅胜 ● 养生修性
● 服饰英华 ● 中华烹饪

● 本册

刘晓东

主编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哲学类



《中国文化精华文库》编纂委员会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明 刘先枚 任继愈 许嘉璐 张岱年
梁步庭 容肇祖 蔣泽非 程千帆 蒋维密

策划 石洪印 鲍时祥 郇玉华

主 编 董治安

副主 编

执行副主 编

王修智 魏 明
鲍时祥 郇玉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洲 明 王培元 刘晓东 吴良训 徐 超

《中国文化精华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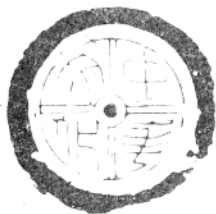
石洪印

副主 任

杨光志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克平 王为珍 王洪信 刘德久 孙宝林
陈学振 李新民 李道生 张士宝 张华纲
张 鲁 国桢明 杨海桥 姜德成 郭焕芳



弘揚中國文化

祝中國文化精華出版

辛未年五月月林



前 言

从草昧洪荒中走出来，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就在这片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悠久的历史，创造着灿烂的文化。

早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诗三百》楚辞的出现，就已经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涌起，而两汉辞赋、唐宋诗词、元明清戏曲小说更相代兴，使整个古代文学领域不断出现繁荣昌盛的新阶段；著名的二十四史和大量别史、野史著作，充分显示了我国史学成果的辉煌及其传统的源远流长；诸子百家的争鸣，儒、道、释三家的对立存在和交互影响，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那种堂皇而绚丽的色彩；几千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其他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多方面、意义重大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注目，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进步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证明：是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多姿多彩，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文化传统教育；也为了有助于国际朋友真切、系统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本着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我们编纂了这套《中国文化精华文库》大型丛书。丛书分二十

一分册，共约七百余万言。

应该承认，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读物已经出版了不少。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编纂的《中国文化精华文库》自身价值究竟何在？换言之，从总体上看，《文库》以哪些新的特色与读者见面呢？

首先，这套书具有普及性。它明确地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和粗通汉语的国际朋友为直接服务对象。为了满足这一文化层次读者的要求，我们力图使丛书在内容表述上深入浅出，形式上注重通俗性，可读性，趣味性；在选材上，我们还注意尽量涵盖中小学教育中所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识。

其次，这是一套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丛著，具有自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它大体包括了文艺、历史、哲学、科技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而就每大类内容而言，它既照顾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又突出了有代表性的流派和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色，反映了不同的倾向和风格，乃至每种专书、每个专题的诸方面。在精选优秀历史遗产这一总目标指导下，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尽可能准确地显示我国民族文化的整体风貌。

再者，这是一套旨在引导读者直接阅读古典文献的“文库”。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古籍评述和介绍，也不同于古籍的选注、选译。它以理性知识为纲，感性知识为目。每个分册不论具体编写形式如何变通，都一定要在本学科的总体描述和对专题或选文内容的辅导性说明之后，选录有相当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原文加以译述。非文献性文化精品，如书画、建筑、服饰等，则示以实物图片。为了增强科学性，所录原文一律要求选用比较精善的或比较通行的版本。为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文采用亦译亦述形式，随时加以必要的串解或说明。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本丛书的现实意义，也深感责任重大。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学科分类多，历史跨度大，时间紧迫，撰写者分散全国各地，编委会人手不足，水平有限……。凡此，都会使我们工作难免出现种种疏漏甚至错误。我们的态度是：克服困难，细致工作，力争较好的质量，尽量把各种疏误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诚恳地欢迎专家和读者就书中问题发表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以便将来把《文库》修订得更好。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先生热情关怀丛书编纂。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秘书处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把《文库》纳入“八五”古籍整理规划。新闻出版署将其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山东省出版总社领导及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自丛书酝酿编纂之初，就明确地给以支持，经论证，毅然将《文库》列为1992年重点出版选题，并专门成立了丛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决定由以上四社共同承担出版工作，一次推出整套丛书。总社还给予经济支持，保证了前期组稿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分册的主编和作者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忘我工作，如期完成了预定任务。可以说，没有多方支持，没有大家切实有效的通力合作，要顺利完成这项庞大工程是不可能的。编委会谨向所有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各种形式指导和帮助的领导、同行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文化精华文库》

编 纂 委 员 会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前言	(1)
漫长历史中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的精髓	(1)
一、古老殿堂中的圣典	(13)
导读	
1.神秘的奥义书(《易》)	(13)
2.古老的官方档案(《书》)	(26)
3.民间和庙堂的诗歌(《诗》)	(37)
4.修身治国必读(三礼)	(43)
①《周礼》	(43)
②《仪礼》	(51)
③《礼记》	(58)
5.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春秋》三传)	(66)
①《左传》	(66)
②《公羊传》和《谷梁传》	(75)
6.孔夫子的语录(《论语》)	(85)
7.“第二圣人”滔滔不绝的宣教(《孟子》)	(98)
8.儿子的教科书(《孝经》)	(110)
9.第一部词典(《尔雅》)	(114)
二、被捧上最高地位的圣学	(118)

导读

- 1.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 (122)
 - 2.万能的治国之宝 (129)
 - 3.古文经和一封挑起争端的信 (147)
 - 4.皇帝的厨官和卖大饼的吵个不休 (157)
 - 5.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73)
 - 6.皇帝说：都别吵了，确定个标准解释吧 (190)
- 三、《五经正义》和敢于怀疑 (202)**

导读

- 1.还是让我自己来捉摸一下圣人的意思 (211)
 - 2.跳出前人的圈子 (234)
 - 3.“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264)
 - 4.闭起眼睛当圣人 (282)
- 四、冷静的审案官和聪明的宣教师 (297)**

导读

- 1.睁眼仔细看，里面有假货 (303)
- 2.圣人是何意，我有证据 (326)
- 3.微妙的意思在里面藏着呢 (353)
- 4.最终的完善等于拆毁 (376)

漫长历史中社会意识和 道德观念的精髓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了极其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同时，我们民族又被这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哺育着，凭借着由它而形成的高度的凝聚力，经历了无数磨难和曲折，巍然屹立在世界上。

你可曾想过吗？在这丰富而灿烂的文化的背后，在我们民族心灵的深处，有着某些基本的意识和观念。不管有人把它看作“灵光”也好，还是把它看作“阴影”也好，总之，是有那么一些意识观念存在着，并且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启迪、约束、规范和塑造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滋润着我们历史的文明。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无论这些观念的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都深深地渗入我们文化之中了。无论是尊崇、还是反对它的人，都无不受到它潜在的影响。

那末，这些意识和观念是什么？它们又来源于哪里呢？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满怀歉意地说：这不是我们能简单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对第二个问题的述说中，指出这些意识观念的迹象和进行寻求的线索，以便能够渐渐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接近。

这些意识观念来源于哪里？它们就来源于在我们历史中陆续被尊奉起来的十三部书中。这十三部书就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由于过去人们一直将它们奉为神圣的经典，因此称它们为“十三经”。而对这十三部“经书”本身的整理、考订、阐释、发挥，也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术，称为“经学”。

首先我们要说，这些“经书”是谁写的？为什么叫做“经”？最早只有“六经”或“五经”的名称，指的是《周易》《尚书》《诗》《乐》《仪礼》《春秋》（其中的《乐》，有人认为只是乐谱，本来就没有成书。也有人认为《乐》本有书而经秦始皇焚书后失传了。但不管怎样，反正汉代已见不到了，因此去掉《乐》就称“五经”。）对这五部书，前人有的认为它们是由孔子完成的。孔子把周朝的典籍编排删定，加进自己对于社会的政治理想、人际的伦理观念以及人格的修养轨范等所谓“微言大义”，从而形成天经地义、万世不变的神圣法则，用来垂教后世的。但也有人认为，所谓“经”，原本是指织布的纵线，先秦时代，文字是写在竹简上，用线（皮绳）把它们一简一简地按次序联贯起来编缀成“册”（也写作“策”。）所以如果用后代的说法，只不过就是“线装书”而已。周代这些“线装书”分别由朝廷各有关部门的官员负责掌握，孔子把它们整理起来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并认为：人们通过学习《诗》可以培养温雅柔和、诚朴厚道；学习《尚书》可以通晓往古、明达史事；学习《乐》可以培养开阔博大、平易善良；学习《易》可以培养思维精密，穷究事理；学习《礼》可以培养自我检束、庄重恭敬；学习《春秋》可以培养比列事类、条

理清楚。通过孔子的整理和传播，“六经”于是由原来的官书转移普及而成为士和平民的学习教材了。

我们说，无论“六经”是孔子制作的“万世大法”也好还是孔子整理的文献教材也好，总之，孔子是与“六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后代一直把“尊孔”与“读经”相提并论，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由朝廷设置博士，讲授“五经”，经学成了官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五经”为内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便占据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主导了两千多年来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意识观念。这些经书的内容被当作永远不可改变的道理、法则和教化，“经书”一直是图书分类中的第一类，“经”也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权威性、根本性学说的意义了。

根据这个意义，后代陆续又尊奉起几部书来和“五经”并列，也称之为“经”。大致说来，唐代增加了《周礼》《礼记》，又将《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列，称为“九经”，又增加《论语》《孝经》《尔雅》称“十二经”，宋代再加上《孟子》，便成为“十三经”了。此后经书就再也没有增加数目，只是宋代的朱熹作了一点改动，他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来，分别独立为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后人与《周易》《尚书》《诗》《春秋》《礼记》并称为“四书五经”。

今天我们看来，这“十三经”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它们涉及了很多学科领域。前人曾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经书都是史书。这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如果具体分析一下这些经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周易》原本是用于占筮的书，

经过孔子及其门徒们的补充阐释，成了一部哲理性的著作，其中体现了一些周代初期的社会风俗以及当时人的思维方式；《尚书》是殷周时期的官方档案汇集；《诗》是周代民间和庙堂的诗歌集子；《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其中《周礼》又称《周官》，是周代曾部分实行而又经过理想化的官制；《仪礼》是人们在各类事情各类场合的具体行为的规范仪式；《礼记》其中一部分篇章进一步阐释《仪礼》的内容，另一部分篇章则又阐发儒家的礼教思想；《春秋》是东周时期的编年史，《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的。其中《左传》补充了大量的史料来解释《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则通过归纳分析《春秋》记事的条例来探求《春秋》的政治伦理思想；《孝经》是家族伦理学；《论语》《孟子》是孔子和孟子的言论集，阐发儒家对社会政治的理想和个人道德的法则；《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它本来是用先秦时期的标准语解释方言异称的，由于它包含了对经书中很多词的解释，因此可以看作是理解经书意义的阶梯和桥梁。总之，这些经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就在于注重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两个方面，着眼现世，不谈来世；强调人本，排斥虚妄。因此，统治者用它们来说明统治的合理性，统一和制约人们的思想，培养统治人才；学者们通过研究它们来探索社会和人生的哲理、修养理想中完美的人格；而广大的读书人又通过诵读它们来得以进身仕途，取得利禄。因此在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中，经学始终占据着各门学术的主导地位，起到了抵制宗教思想，巩固封建制度、延长封建社会寿命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封建社会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经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变化着。由于经书本身内容的丰富，使它可以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出不同方面的引伸和发挥，而研究者也可以致力于不同的侧重而促使经学向不同方面发展。于是经学便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如果根据时代来划分，经学可以分为两派或四派。分两派是汉学派和宋学派。分四派的话则两汉一派、三国到隋唐一派，宋元明一派，清代一派。如果根据思想方法来划分，可以分为三派：西汉今文经学一派，东汉古文经学一派，宋代一派。

我们觉得，对于经学的源流派别，应把时代变化与思想方法结合起来看，因为往往由于时代的改变而导致思想方法的差别。

西汉建立之后，统治者把秦王朝只经历了这么短促的年代就灭亡的历史作为前车之鉴，儒士们对秦朝灭亡的原因也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分析，统治者竭力稳固既得的政权，亟需某种理论来支持和维护。西汉初年曾一度施用过“黄老学说”，但“黄老学说”作为一时权宜的办法还行，但作为统一国家的主导思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内容便显得贫乏而不能依靠了。而且当时各种学说都在流行和传播，纷纷乱乱，是非都没有个标准。汉武帝“表章六经，独尊儒术”后，于是这时的经学便承担着为王朝政权服务的现实任务而登上了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宝座。统治者需要从经书中寻求证明王朝政权合理性的根据，寻求统治的理论和方法。而经学学者们也使竭力利用经书向统治者提供所需要的理论根据和统治法则，根据经书中的意义来判别是非，统一思想。他们从各方面说明，孔子创作“六经”的目的就是为汉朝制定大法，而这大法是神圣不可

改变的，要绝对地依此来解决政治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另外，这时期“神道设教”的意识还很浓重，他们把经书中记载的自然灾异和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必然性联系起来，据此而将当时所发生的日食、星变、地震、气候反常等都当作社会将要发生某种事件的征兆，以儆戒统治者改变行为措施，保持长治久安。并且在经书之外，继承了先秦时期方士的图讖（chèn）之学，制造了一些预言式的书籍，称作“纬书”，表示它们与经书是内外经纬相辅而行的，这就更便于他们自由附会来为统治者服务了。他们这一番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成功，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议，无不依经义为根据。朝廷以此作为钳制臣民的工具，士人以此作为博取官禄的途径，经学的权威性于是形成了。从此，经学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巩固下来，而它的“灵光”也覆盖在整个社会之上了。

这时期的经学显示出来的特徵，就是把孔子推上了最高位置，把孔子看作是政治家，把“六经”看作是孔子理想政治的学说，着重从经书中寻求“微言大义”，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十分密切。

西汉末年陆续发现了一批用先秦文字书写的经书后，引起一大批学者们进行研究和传授，因此形成了“古文学派”，而把西汉研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经书的人称作“今文学派”。这些“古文学派”的学者们为了使自己的古文经书取得官学的资格，和原先早已占据官学位置的“今文学派”的学者展开了长期的论战，而“今文学派”的学者为了独享既得的地位和俸禄则大加反对。东汉初期的“古文学派”学者为了取得官方地位，在他们自己的学说中不得不混杂上一些“今文学派”的说法以迎合当时的风尚。“古文学派”的大师贾逵为

了使古文经书《左传》立学，表示《左传》的优越，甚至从《左传》中找出“刘姓是帝尧的后代”的记载来，替皇帝续上了这么一个光辉的家谱，以此博取皇帝的欢心。因此，如果单从“今”“古”两派学者的个人目的来看，都不怎么高尚，但这并不说明两派之争在经学中没有意义。“古文学派”不立于官学，是以学者私家传授的，因此减少了对现实政治的依附性，很有“为经学而学经”的意味。逐渐减少了虚妄附会而转向实事求是，减少了引伸发挥而转向字句考证。另外，由于古文经书都是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学者首先要对语言文字下一番功夫才可以对经书进行诵读和研究，因此“古文学派”的学者大都是一些语言文字的专家大师。他们着重通过对经书文字的正确解释而探求和阐发经书的涵义，形成了章句训诂的学问。然而，过分地解说字义、考证名物，也就产生了烦琐细碎忽略经书中完整意义的弊病。

至于在经学思想上，这派的基本特徵表现为，把孔子看作是史学家，教育家。认为“六经”是周公制定的，是周代的官书，孔子“述而不作”，整理了这些官书，也只是古史材料而已。

东汉末年，“古文学派”的大师郑玄立足古文，兼收今文，“融贯古今，遍注群经”，以“古文学派”的胜利而结束了这长时期的论战，完成了经学在这时期的统一。那末，“今”“古”两派水火不容地争论了这么长时间，影响或动摇了经学在社会思想中的统治地位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实际上反而使经学地位更加巩固了。为什么呢？因为“今”也好，“古”也好，它们都是经学之中的两个派别，同样尊奉“六经”。它们之间由于争论，不得不加深对经书的研究，寻求论据、完善

理论，以求驳倒对方。这样便丰富了经学内容，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对经书的研究也更加全面，加重了经学作为一门学术的自身份量。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并影响到经学，王弼、何晏用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解释《周易》，不采用训诂方式，专门探讨名理，改变了两汉时期的治经方法，是这时期比较突出的特色。

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经学研究的深化时期。这时，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已近于消失，而东汉时期的“古文派”经学虽算胜利了，但同一部经书又有不同的注家，对经书的解释仍然有很多差别，学者们尊奉的注家不同，自然对经书的理解也就不同了。理解不同，也免不了争议，不过这种争议和汉代“今”“古”文之间的争议就不一样了，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再是争立于官学而只剩下学术观点之争了。这时对经学的研究是通过“义疏”的形式进行的。所谓“义疏”，是受了佛教中讲授和解释佛经方式的影响，就是对经书包括注文进行更加周密的分析 and 铺陈，形式上也就更加繁琐。当时正值南北分立，因此南北方的学者尊奉的注家不同，学风也有差异。大体说来，南方学者言词比较华美，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也比较大，而北方的学者保存东汉以来经学家的传统比较多，言词也比较朴实。但是运用“义疏”的方法和形式，南北倒是一致的。

唐代奉朝廷旨意撰成《五经正义》，后来又陆续有所增加，确立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统一了南北朝时期的“义疏”。所谓“正义”就是立标准，而不是创新说，所以这时的经学，是集成性的而不是开创性的。

严格说起来，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时的经学很难说能成“流派”，我们只能从时代特色来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可

以用“义疏之学”来概括，而唐代经学可以用“正义之学”来概括。

宋代经学则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唐代时期封建社会的格局已经完成了，各种制度已经完备了，意识形态已经稳固了，而经学本身也已经成熟了，于是经学要再发展，势必要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经书的解释既然定了统一的标准，科举考试谁也不能稍有违背，在这种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的情况下，不能不有大的变化。中唐以后，便有人开始冲破《正义》的束缚，摆脱前人的传注，阐发自己的理解。宋代经过五代十国的纷乱，经过几十年的政权迭起、君君臣臣等伦常观念破坏的局面之后，需要正人心、严君臣，于是经学就向心性伦理方面发展了。

宋代经学的代表人物当然是朱熹，他在经学史中起的作用和占有的地位相当于汉末的郑玄，（如果说在我国整个思想史中的影响，当然比郑玄还大。）他对唐人的“正义之学”很下过一番功夫，但另有着眼点，不受前人的束缚，比如对《诗经》，他研究的方法是“读《诗》，且只做今人做底诗看。”不但不拘守孔颖达的《正义》，甚至连毛《传》郑《笺》也敢于不相信，直接把《诗》拉到自己面前来，根据自己的心思去体悟。研究别的经书也是这个办法，绝不跟在传、注、疏后面跑。这样的研究方法，自然取得了很多前人所未能获取的成果。这还只是研究方法方面，至于研究经书的目的和思想，与前人就更不同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经学宋学派他们把经书认为是孔子载道之具，学习经书是为了在个人身上下功夫，正心明性、变化气质，使自己通过学习而逐渐成为“圣人”，经学思想不仅是治世的大法，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内心世界，“经学”